

L O C A L K N O W L E D G E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

地方性知识

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中央编译出版社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 著
王海龙 张家瑄 译

新世纪学术译丛

A decorative frame made of multiple overlapping, flowing ribbons that encircle the central text. The ribbons are rendered with fine lines and shading to create a three-dimensional effect.

地方性知识

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图字:01-1999-1463

Local Knowledge Copyright © 1983 by Clifford Geertz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1999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Subsidiary of
Perseus Books L. L. 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由 Basic 图书公司通过 Arts & Licensing
国际公司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美)吉尔兹(Geertz,
C.)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1

书名原文:Local Knowledge

ISBN 7-80109-346-1

I.地…

II.①吉… ②王… ③张…

III.文化人类学-研究-文集

IV.C9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599 号

地方性知识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发行部) 66117130(编辑部)
E m a i l	cctp @ public.east.cn.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78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100 册
定 价	24.80 元

导读一：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

王海龙

阐释人类学是近年来在西方文化学研究领域异军突起的一支，以其对文化符号的破译及对文化行为的深层描写及阐释深获学界的瞩目，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阐释人类学在近年来已渗透到了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在哲学、语言学、宗教研究、心理学、神话学、民俗学、文学批评、剧场学甚至电影、艺术及美学以及广告业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迄今为止，阐释

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已经越过了符号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和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而成为当代文化人类学在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上影响力最为卓著的一个流派。

虽然作为批判的武器和崭新的方法论,阐释人类学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一本工具书,甚或西方最权威的人类学工具书对其名实加以规范,或对这一辞目进行过哪怕是最简单的界说。于是,阐释人类学本身即成了一个需要阐释的命题。

鉴于这一命题的严肃性和迫切性,非剔抉爬梳大量的学术背景及原始材料难能给其定义;筚路蓝缕,滴水穿石,笔者只能在大量阅读其基本文献和把握其理论脉络的基础上,对其本义加以归纳和评说,从事这一工作的学术历程和开创之艰苦是难以言说的。

为了便于充分展开对阐释人类学的探讨,我们有必要在此对其历史渊源作一番回顾。

“阐释”这一术语的原始义源于拉丁语 *interpretēs*,意为在两方面之间的一个中介体(或中介人),或简而言之,即二者间的捐客或谈判调停者。因而,阐释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传译和沟通的行为,所谓“传达者”、“译者”是也。

什么样的东西需要阐释——传达和透译呢?当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不熟悉其背景的、年代久远湮灭的文献;另外则是异己的外来文化的资料。这便是阐释学兴起的最早渊源。至于符号学和语义、认知诸学的介入和加盟,则是较为晚近的事情了。

基于上面的两个最根本的命题,阐释学的最早期代表应是

释经学，它古代的鼻祖是圣奥古斯丁(354—430A. D.)，阐释学的本原是阐释宗教的经典和本文(text)，试图以历史和逻辑为依据，来解决宗教和哲学本文中的晦涩难解的涵意。圣奥古斯丁在其典范的阐释学著作中声称，阐释学的任务就是去寻求“发现和理解这些事实的一种方式，以及去传授我们所获知的事实的一种方式”(《论基督教的教义》，公元427年版)。^①

这种倾向性在其后的圣经文献学研究和基督教神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成为基督教阐释圣经本文、教义以及明德、布道、宣讲教义和教学法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阐释学对现当代产生影响则渊源于近代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对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震撼。它的近现代的学术代表是德国学派。它渗透到了神学、文学批评、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范畴。

而在当代人类学领域，阐释学理论则在批判19世纪以来的各种人类学理论，在发展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文化人类志的文化系统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代阐释学真正兴起的标志是18世纪末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艾尔马赫(Friedrich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施莱艾尔马赫开创了圣经阐释批评学。他阐发了在深层意义上对圣经本文能动性的主观诠释化理解而不仅仅泥滞于本文的字面义。他有机地把对本文的理解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一)对书写材料的语法学意义上的理解——从语文学本源去探讨字、词、句、章，去对本文进行解码式的研究；(二)施氏在此强调一种心理感知性的理解(psychological feeling/understanding)。这种理解允许阐释者从跨文化、跨历史乃至超验的本质方面去阐释叙述的本质。施氏在其论说中，已经提

出：不同文本、不同文化中阻隔作者和读者间的历史距离（亦可以是文化的距离）只能通过批判性地阐释和再置来加以克服。⁽²⁾他的这种界说是十分精辟和具启发意义的。虽然他的学说没有直接影响后来的阐释人类学，但其在方法学上对后来的启示于此已可略见端倪。

对阐释人类学有着较为直接影响的是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和 20 世纪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狄尔泰是这一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他在人文科学、哲学上的贡献曾被认作是施莱艾尔马赫神学的世俗版本。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其明确界定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发展了研究人文科学的独特方法论。此外，他还从文化观念上确立了研究历史的综合方法，对文学研究曾有过重要的影响。他提出，在人文科学中，“心”的概念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从而在人文科学研究中强调了人类自我意识的深刻性和充实性，意志的自主性等等。狄尔泰在阐释学上的重大贡献，在于他把阐释的课题从对本文的研究上升到了对人类文化以及人类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他强调阐释的任务在于提供人们社会、文化上的互相理解，特别是他晚年关于社会和集体性格意蕴的和表达的强调，他对文化概念的探讨，都直接对当代文化人类学思想产生了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后来阐释人类学思想家吉尔兹的某些理论上的渊源。⁽³⁾

在把阐释学理论推向文化和社会学研究上，狄尔泰和韦伯在很多方面的见解都是相同的。他们对阐释功能更进一步的重要界定是“理解”（这距当代阐释人类学的金言“在解释之上的理解”——understanding over explanation——仅差一步之遥）。他们认为，“理解可以察知并重塑别的个体的精神世界，并发现

别人主观世界的概念以及其行动的原动力”，可以“在你中再次发现我”，置你入我，设身处地，这已不仅仅是理解，而且是分享或感知到了别的人们的生活。^[4]说得多么好啊！在上面的立论中，其实已经揭示了后来阐释人类学的根本理论主张。

韦伯对阐释学的积极贡献在于他把阐释学引入社会学领域，用阐释的方法去分析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材料，诸如文化、社会变迁、经济行为等，并且更深一步地以之研究新教和当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以及古代犹太、印度和中国的宗教。韦伯除了认同狄尔泰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材料中关于理解的重要性以外，还特别着意于了悟对其发生原因的阐释。^[5]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不同时期的阐释学都共同借用了“理解”这一术语，但“理解”的本质在它们却略有不同：

神学阐释中的“理解”专注于语言学并强调其“语法知识”，意在通过先验的，跨越历史的，符号及象征、转义的研究来阐释经典为宣教服务。

对狄尔泰而言，其“理解”的目的在于重构本文作者的心灵世界。

而对当代阐释人类学者而言，“理解”的本质涵意又不尽相同。

吉尔兹认为，阐释学的目的即从高层次的普同化和人类学的细节的往还中借助社会话语而臻至对复杂纽结在一起的符号形式的“理解”。^[6]而达成这种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者对被理解的客体应持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7]（马林诺夫斯基语）。

而另一位当代阐释人类学学者维克多·特纳关于理解的理解则直接出自狄尔泰的阐释观，并试图以之去探讨、“理解”仪式的无意识目的以及其他的文化的表现模式等。

在当代,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复活了阐释学应归功于吉尔兹。他的主要著作可以被理解为用其对民族志材料的分析来阐扬韦伯的社会阐释学传统的例证。恰如韦伯,吉尔兹专注于文化的概念在社会和经济行为中的动力学作用。他深入研习了符号系统,并通过宗教、社会、经济的实际背景(contexts)去理解他所研究的当地文化持有者及其文化。像韦伯一样,吉尔兹专注于宗教的理想和符号是怎样影响了历史的发展和其社会制度,而他超越韦伯的是其在分析中更注重对世界上的宗教的不同文化背景的阐释及界说。吉尔兹更注重在比较和经验的层面上应用阐释学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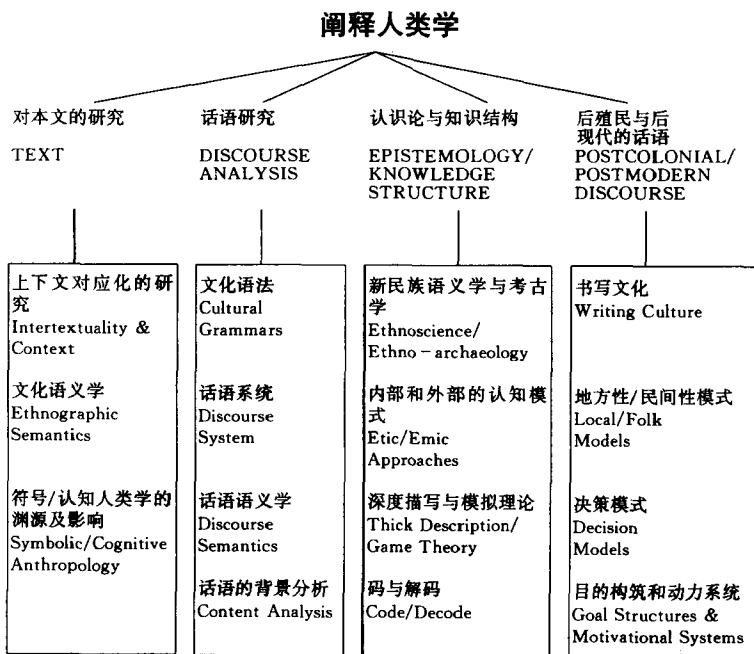
不同于狄尔泰的是,吉尔兹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

受训于英国传统的维克多·特纳最初关心的多是通过文化信仰以及行为的后果的调查来研究社会的进程。虽然他始终警觉于社会结构的冲突和矛盾,但早期的结构功能主义训练始终对其有着影响。这些,在其研究扎伊尔人的解决争端、政治继承和生命循环仪式(即青春期入社礼仪)等中都体现了出来。在其对解决争端的研究中,特纳拓展了他的“社会戏剧”(social drama)的观念并以之作为工具去分析社会的变革和延续间的关系。^[8]特纳在其学术生涯的晚期才开始专注于阐释学方法。他在阐释学的应用上更接近狄尔泰,其表现在于更着力于对如仪式、社会戏剧、剧场这类情绪化的、有别于认知性的“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s),而专注于恰似狄尔泰所谓的可以被理解的“生活经验”方面。不同于吉尔兹,特纳强调其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遇到的一些跨课题的特点。对特纳而言,文化人

类志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试图理解“文化上的他者”(a cultural other)。他把它认作是通过其“文化表演”而进行的跨课题的意蕴交流,而且是在高度政治化和危险的世界里对别人的审慎的误解的抉择。^[9]

前面我们说过,当代阐释人类学的宗旨是“在解释之上的理解”。这就要求文化人类学者的角色是一个中介人而不是一个自悻的观察者。文化可以“阐释”,同时又可以“在解释之上”理解吗?虽然狄尔泰提倡屏去成见悉心体悟是阐释者的第一要务,但恰如“子非鱼,安知濠梁之乐”的千年论争一样,较激进的论争者认为阐释—理解是不可能的。如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并不是重构而只是媒介”(Understanding is not reconstruction but mediation)。^[10]在这种意义上,吉尔兹对之纠正道:“我们所谓的我们的资料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构筑的别人对其自身和其同侪对自己的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尔兹认为,从阐释学的观念去看,文化不是决定行为的“权力”,而是使人类行为趋于可解性的意蕴的背景综合体。^[11]从而廓清了阐释人类学的意义和根本内涵。

对阐释人类学的上述理论回顾使我们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剖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综合阐释人类学的理论渊源、文化背景及其在当代文化人类学学术探讨上的革新与贡献,我们可以把阐释人类学的方法和主要命题总括在下面几个主要的范畴里。



在论述当代阐释人类学的发展时，我们除了要理清其脉络和历史渊源外，在言及其纵横上下前后的关系时，至少要弄清它与下面的几个交融混杂的流派和学术思想暨认知人类学、符号人类学、民族语义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间的关系。在清理这一部分的学术思想时，显而易见地，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很多交叉，故阐释人类学的主要代表者吉尔兹在很多评论里又被列为上述领域里的主要代表者和思想家等。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详细论述。

二

在考察阐释人类学的理论渊源和其在 70 年代兴起的学术背景时，我们留心到了这一时期在学术思想上的一系列摧毁旧有知识结构的努力。这一时期学术理论压倒一切的基调是破旧立新，在废除旧的成见方面很多的思想家在努力推翻前论，这种学术思潮给予时代精神以大的冲击，而且涌现出了一些史无前例的富有革命性的创见。其中最为杰出的是吉尔兹对“本文”文化意蕴深刻的阐发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对“话语”(discourses)以及对事物本原性考掘而引发的批判性重新认知的新思维。在某种意义上看，如果说福柯是旧有思想和知识的颠覆者，那么吉尔兹则试图成为新的知识的阐释和再造者。为了便于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学研究状况有一个较为整体性的认识，我们拟把吉尔兹和福柯放在同一学术背景下加以比较论述来展示其时代的学术精神。

吉尔兹对阐释人类学思想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他重新阐释了本文(text)的观念。“本文”一词的原始义指“书写或刻印下来的文字或文献”。旧的阐释学(hermeneutics)虽已借用它来研究和解释《圣经》和古典文献，但其范围仅限于对书写符号的研究。因之，“本文”研究的属性含有通过大家可以共同察知的符号去理解符号所体现的意义结构(或概念系统)的内涵。基于此，本文的研究被划归为富有符号意味的哲学、结构主义乃至符

号人类学、语义学等的范畴。虽然经过近代思想家如狄尔泰、韦伯等的倡导,阐释学的对象渐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及其历史过程,但其基本思路仍是有局限的。

海德格尔(M.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虽着力把阐释学的概念进一步本体化,并将其所指范围扩大,但其影响力毕竟有限,而且缺少学术实绩作为其理论的支撑。直到吉尔兹,才真正强有力地鲜明倡导本文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描写的系统(system),它既可以是文字的,亦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文化即本文”,并试图真正从相关意义(context)上去研究、阐释文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尔兹旗帜鲜明地强调阐释学对开展文化研究的指导性意义,并身体力行地将之引入了自己正在从事的文化人类学实践。他声称自己对文化研究的取向是“阐释学的取向”,自己从事的工作是“阐释学的工作”^[12],而他给予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著作的命名也是《文化的阐释》,这足可见他对这一学术思想的钟情和珍视。

在吉尔兹的概念中,本文已远不是符号本身,而是一部“以行动描写和揭示着的文化志”,是立体(holistic)文化之渊源,这一对本文的阐释就是对文化的最深刻的阐释,也就是文化人类学者工作的终极目标。吉尔兹曾精辟地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多种本文的综合体,而这些本文自身又是另外一些本文的综合,人类学家则需倾全力去确切地解读本文的本质。”^[13]

在今天,吉尔兹卓有成效的论断已随着他本人在这方面创造的实绩和成就几乎影响到了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吉尔兹本人也因其对文化阐释的杰出贡献而跻身于当代最出色的思想家之列。但究其实质,除了上述阐释学的渊源影响外,吉尔兹本人所受的人类学思想史的训练以及近百年来欧美人类学理论

发展的要素也给他提供了将二者结合并革新、从理论上发扬光大的契机。也就是说，吉尔兹的成功并不仅得之他的个人资质以及他的哲学、阐释学的修养，这一时期学科的发展也必然使得在阐释学与人类学相遇的交叉口上历史地把发展阐释人类学的重任放在了吉尔兹的肩上。

我们已给予了足够的篇幅介绍阐释学源流，本世纪以来人类学思想的发展及其对本文研究发生的重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是吉尔兹阐释人类学思想的一个先驱的代表。他对欧美当代人类学思想的影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博厄斯首倡对美洲印第安文明进行史无前例的调查，研究其语言及文化的关系，特别着力于对文化描写的强调，他对印第安人语言调查的资料以及对其文化习俗的细致描写被当今学界公认是吉尔兹“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的原始范本和理论滥觞。^[14]

博厄斯以外，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的影响亦不容忽视。马林诺夫斯基着重从文化的结构和功能入手去研究文化的意义，在其研究中当然不能忽略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和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contexts)，同时他对文化的功能、象征意义的综合探讨对当代阐释人类学影响极大。当然，我们也不会忽略，他关于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描述阐释的见解，在吉尔兹的阐释人类学中占有着举足轻重、一以贯之的指导意义的地位。

言及本世纪人类学思想对吉尔兹本文理论的影响，我们不可忽略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和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的贡献。他们对语言结构生发到文化结构的探讨，从对神话、民俗的研究到对无意识

的研究,从对隐形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到对“文化语法”,对文化的深层结构(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culture)的剖析等都极大地启悟了吉尔兹的灵感,对其文化本文(cultural text)观念的创立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15]另一方面,韦伯和杜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在把社会学和科学的方法引入人类学研究,对“结构”、“集体观念”以及对体系化结构形式的探讨的背景开拓等,也都对吉尔兹本文观念的形成和完善有过很大的助益。^[16]

在破与立的两大学术倾向在本世纪70年代前后的表现上,把吉尔兹与福柯作一比较可较易厘清此期学术发展的渊源及线索。与吉尔兹重释本文并为之灌注新的文化涵意相媲美的是此期福柯对话语(discourse)的重新认识和全新的理论界说。

当代话语研究(approaches of discourse)和本文及范畴背景(context)的研究本来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它们都有其语言学研究的渊源,或者更确切地说,皆是从对语言结构的研究生发到对文化结构的探讨的。从语言学本身看,它的对象最早源于从书写的语言到日常的口语;而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它则是从分析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入手,进而把话语看作语言和社会行为本身,通过文化背景(cultural context)来研究社会实践、符号程序的互动,以及诸如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

福柯在当代话语研究中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他严峻的批判精神及对理性主义的深刻质疑与再探讨。福柯的学术挑战性在于敢于推翻似是而非、延续无数世纪的一些术语乃至学术上的定论,而执着于对原学的考求和对深层文化的探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对人类以往的知识进行一番理性的巡礼和学术回顾。本着这种批判精神,他惊讶地发现世代为我们尊为神圣

和富有认知功能的语言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质疑的。我们通常把语言看作认识事物和表达事物的终极，追溯到了最原始的语言、字汇概念，似乎就溯到了源头。传统地理解，语言是话语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而话语则是知识系统，是文化体系的外现，换句话说，是构成我们全部知识的材料。而福柯富有革命性的创见在于他对语言本身的质疑，亦即对文化从根本上的挑战。

追本溯源，福柯探讨人类知识的构成是由对概念的攫取和把握迄始的，那么，它大约是经历了这么一个巡行的过程，即：字源→意识源→知识源→思想源→理性根源。在上述进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错则下一个环节即可能出错；如果源头错或因其导致个个环节错，试想，那该是怎样的一个情景！

在福柯的体系中，话语实际上是统治（一切 的统治，归根结底，是语言的统治，它是用语言表述亦是用语言来指令、传播的）的根本，是统治的“系统”。说得更宽泛些，是“文化的体系”。语言和话语本身亦即权力。^[17]

福柯对话语本身的认识亦是深刻的和富有历史感的。他对“话语”有过不同的阐释。阐释的学说中，话语本指谈话时说话者（speaker）将其理念或讯息以一可以辨认而又组织完整的方式，传送给一听者（listener）的过程。而福柯又扩大其定义，泛指人类社会中，所有知识信息之有形或无形的传递现象皆为话语。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其特定的话语存在。这些话语互相推衍连结，形成一个可以辨认的“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同时，福柯又认为，我们的历史文化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所组成的。所谓话语指的是一个社会团体根据某些成规以将其意义传播确立于社会中，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交会的过程。因此，我们所接触的各种政教文化、医农理工

的制度与机构,以及思维行动的准则,都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话语运作”之表征。这些“话语运作”也许并行不悖,也许时相冲突,但在其下总有一个轨迹架构可资依循,也就是福柯所谓的话语形构。^[18]

福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对本原的质疑,对话语构成渊源的深层剖析。

有福柯作为参照系,我们更易理解判别吉尔兹在阐释人类学上的学术贡献和思想价值。如果说福柯是旧有思想和知识的颠覆者,那么吉尔兹则试图成为新的知识的再造和重塑者。

如上所述,无论是吉尔兹对“本文”的研究抑或福柯对“话语”的剖析,皆是对文化体系的实质的深层意义的系统探讨。福柯的着眼点在于对西方传统的颠覆,在于对语源学的审视、批判,反对成见,推翻归纳、类比、推理的理性主义传统,以溯源性的批判精神昭示我们现代知识由于对旧的知识的依赖而导致的以讹传讹的荒谬性。吉尔兹的着眼点则在于对颠覆后的认知体系和文化话语的再造。

针对被福柯推翻的旧有传统,吉尔兹提出了用新的符号手段(即 thick description)和认知角度(即 local knowledge)的概念去重新探讨文化之源。他从另一种意义上重新建立人们对话语(discourse)和本文(text, context)的信心。他富有鼓励性地指出:“人类学的目的即是拓展人类话语(human discourse)的疆域。”而针对福柯的“权力说”,吉尔兹认为:“文化并非随常隶属于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其进程之类的权力;它是一种易于领悟的本文氛围(context)——那就是深度描写。”^[19] 吉尔兹以“深度描写”和“地方性知识”为武器,以观察、移情、认知、自觉地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屏弃一般,寻找个别的方